



两晋演义

蔡东藩·著 二月河·序

蔡先生的这部书·从文学上看去·只能说是中平之作·但·它是一座矿山·山一样的巍峨·中有茂林修竹·流泉飞瀑·内含煤铁金玉·自然也有土·有毫不起眼的砂石·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·前面说过·它不是应遵命评论应运而生·而是应时而生·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·新时代还在阵痛时·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部史诗·可以听为挽歌·也可以看作新时代的催生符·从实效意义上看·它的生命力还在加强·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竖排版繁体字的廿四史的·不能·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也不能·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·要续·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引导你入门·且是独此一家·别无分店·从这个意味上说·真的是厥功甚伟了·

—— 二月河



两晋演义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蔡东藩 / 著

二月河 / 序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晋演义/蔡东藩著. -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3.11

(中国历代通俗演义)

ISBN 7-5039-2405-5

I. 两… II. 蔡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现代

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0739 号

两晋演义

(中国历代通俗演义)

著 者 蔡东藩

责任编辑 秦海霞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,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,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41 插页 36

字 数 700 千字

印 数 5001 - 8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039-2405-5/I·1104
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总 序

·二月河·

长时期以来，“成分”的阴影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徘徊。封建时代，有士大夫、庶人、农工商、地主、佃户、贱民种种“阶层”，或者叫“阶级”。对待各个阶层，使用法律不一，政治待遇不一，经济分配制度也不一，这就造成了阶级仇恨。新中国建立以后，政治、经济、综合国力都有飞跃式的大进步、大改观，惟独“成分”这意识存在依然。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封、资、修”成了新时代的新贱民阶层，与旧时代一般无二的新的社会问题不单“存在”，且是势头不减，愈演愈烈，生命力鲜活。从深层次原因上说，窃以为这就是“文革”的重要成因之一。从根本上认识、解决它的政治家就是邓小平。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，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始，一步一步使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卫生起来、健康起来。

“成分”这种社会政治理念，反射在文学领域，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一边倒和文学评论的单一倾向。一部作品出来，首先拷问它是“香花

还是毒草”。肯定了它“没有问题”，然后再说别的。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，就是服务对象的单纯：为下里巴人而创作，“阳春白雪”便受扼制。很简单，倘若你只爱春天，那么你这个花园里便没有荷花、菊花与梅花。本来，文学应该表述的观念形态是真善美、爱与死，夺人魂魄，陶人性情，增人学养，冶人操守，这种种功能未必样样都与“无产阶级”、“贫下中农”这些阶级成分挂钩。即使是无产阶级，也有一个学习的任务，有提升素养、接受人类美好灵思的必要。事情一旦走向绝对化，必定的后果是“过犹不及”。

老实说，《林海雪原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三里湾》及《苦斗》这些创作都是十分精良的；柳青、赵树理、欧阳山、曲波这一大批作家，都是十分了得的。但由于这种创作理念的局限，在文化枯竭、无别的书可读的情形下，读者选择了它们。它们也有耀眼的辉光，也有大批量的呼拥读者。但是，这只是一时之作，难以永恒，原因也很简单，它本来就是为这“一时”服务的作品。

今天翻翻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，浩然的艺术才华仍在熠熠闪烁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。有的学者反感样板戏，其实样板戏也自有它们怡人的风采，这些学者一听就掩耳，那心里暗示的是腻味反感“文革”这场伤情事。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怎样？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受“阶级说”的影响较少，《李自成》的前两卷我看仍是旷世绝唱，但后来变成“阶级歌颂”，“高、大、全”地表述这个农民领袖，创作的思路就受到了极大的制约。

这些才华洋溢的作家们为什么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？一则是“应人”之作，服务的对象狭小，心胸目光都不能开阔；二则是“应时”之作，“时过”自然“境迁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真个是“求仁得仁又何怨”！

同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文艺评论怎样？著名文艺评论家孙荪曾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：“作家好比是木头，评论家则是木耳。”我以为孙荪的这一断语说得太理想化、太善良了。若说“评论家应该是木耳”，似乎更贴切一些。因为事实上，木头不仅生木耳，还会生蘑菇，生野草，生苔藓……向木头上钉钉子，用斧子劈它成柴，锯成锯末……可以说都叫“评论”。

生木耳，是于人有益的，可以做美味进食，营养作用颇多，但用刀、斧、锯这类利器去评论，得到的是什么？木头们畏惧斧钺加之，就会一律按预先允许的“规范”去生长，这样去要求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花们长出去前就先要想：我不依“政治标准”长出去是什么花？恐怕连狗尾巴草也不是！谁愿意辛辛苦苦爬格子滋长出“毒草”呢？

文学艺术，它的功能决不仅仅是“歌颂”和“暴露”，它还有“告诉”、“讽刺”、“调侃”、“和息”、“要求”、“给予”……诸多中性的心理作用。用了“政治标准”这把惟一的尺子，不是这，便是那；不是拥护，肯定就是反对。表述了改革家、工人农民“火热”的生活，农民起义，那就是“主旋律”，否则，你的嗓门天赋高了，不单不当你是帕瓦罗蒂，还会当你是“噪音”，掩耳而走，甚或“吾虽不及师旷之聪，闻弦歌而知雅意”，当你别有用心也可未知。

用“政治标准”衡量蔡先生的这部书怎样？它既不是“纯文学”，也不是“雅文学”；它不是纯历史，又没有虚造历史；它有歌颂，也有暴露，更多的却是“告诉”、“讽劝”，浩如烟海的历史表述中颇不乏人文思想社会流俗的探讨与调侃。它绝对不可能被我们高层象牙塔尖端的评论居要津者列入“先进文化”的书目里头。

它进行的是人文之美的播种，是中国独有、别国绝无的美好道德的传述和表述。这样老成实在的著作家可能早已在中国“绝版”了。我的估计，历史在一个短的时期不太可能再赐我们一位蔡先生。

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两千年历史传承记载不断的国家，这可能与我们的“敬惜字纸”的民族习惯有关。除了历史，还有野史、私史、笔记、日记……配合这一系列庞杂的体系佐证和辅助或匡正纠谬的资料，还有小说、诗词、说部、传本……直到民间流传的演义故事、书摊、小曲、民歌、鼓儿哼……种种文学与艺术的烘托，众星捧月地簇拥出“二十四史”来（清史尚是“稿”，未能定正）。倘没有绝大学识、绝大胸襟器量、绝好智商与精力，要做蔡先生的这番事业，确实有点像要求初中生演算歌德巴赫猜想般困难，或者是“骑自行车上月球”那样的妄想。

用阶级成分论是无法评论这部书的。你说他有某种超阶级的倾向，那倒是实话。蔡先生是个好老师，他把一个统绪一个统绪的兴亡过程、

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历史表现都告诉你，顶多偶尔地、很温善地流露一下自己的思绪——余下更多的，是给读者以思考判断的空间。

一部好的历史实录，何尝不可当做一部小说和文学作品看？荆轲刺秦王，燕太子丹送他到易水河畔，那种肃杀，秋高凛冽，壮士义行必死的悲壮，慷慨赴义的情致，是极致的文学描摹。《廉颇蔺相如传》是史记正述。“相如因持璧（和氏璧），却立，倚柱，怒发上冲冠，谓秦王曰……”后来见不少辞书注释里说“怒发冲冠”一词出自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这都是不读史书的过。

一部好的文学作品，同样可以看作是历史真实的文学诠释。《红楼梦》就是这样，它不以一朝一代一兴一替为局限，表现的是中国封建历史的整体形态，代代都是这样，这是事实！

然而，好的历史书，好的小说，偏偏都不以“阶级斗争为纲”。贾宝玉是哪个阶级的？曹雪芹歌颂了，赚了三百余年无数人的眼泪。就因为它真实，或者说“实事求是”。

这是蔡先生的追求，他不说假话，也不说曲阿的话。他所演义出来的故事，都在史据中斑斑有考。“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；以逸闻为纬，不尚虚诬。徐懋功未作军师，李药师（靖）何来仙术？罗艺叛死，乌有子孙？叔宝（秦琼）扬名，未及儿女。唐玄奘取经西竺，宁惹妖魔……则天淫秽，不闻私产生男；玉环伏诛，怎得皈真圆耦？种种谬妄、琐褻之谈，辞而避之。”只有这样严肃谨慎的人，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。

然而，我们似乎并不珍惜这些仅存的文史学。还在用“阶级论”这把尺子在量，用斧子去砍它们。

记得在“文革”期间，那些红卫兵们曾经有过一个设想，用农民起义的斗争史取代帝王将相的封建史。想是想，真的做起来，他们还是傻了眼。整个的二十四史中，农民起义只能看做是历史的一种“现象”。这个朝代有，那个朝代也有，支离破碎各自在那里，根本行不成历史的连贯和接绪。我猜“儒法斗争”的那段历史观表述，也是一种很无奈、很勉强地在生拉硬扯表现“阶级斗争”史观的做法罢了。蔡先生的这部堪称“通史演义”的书当然是以帝王将相为主的，受到冷落也在情理之中。

中国的文化中糟粕很多，其中有些东西很要命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种文化中含有的“落后量”和“落后质”。但是不是落后了便应轻视、蔑视呢？这需要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认真思考一下。一只乾隆笔筒，放在现在的书架上，和《大不列颠词典》一处，是增色还是减色？一架春秋“水洗”，已不再用来洗手，是保存研究，还是捧出去卖了铜器？就算碰碎了，比如钧瓷，已经极难见到完整的器皿，但在钧瓷窑址未发现之前，碎片与黄金等价。

我以为，判断任何一部书的社会价值，只有两个量化了的标准，一是它是否拥有读者，二是它是否拥有时间。二者倘居其一，即是具备“素质”的作品。什么是“素质”？它也可能是进步的，也可能是落后的；但它即使是落后的，也是有价值的，倘二者皆具备——即使它是“反动的”，也是永恒的，无法消灭的。谓予不信，可以看看《儿女英雄传》、《蜃楼志》一类作品。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两部作品的主旨是陈腐的、落后的，但是，无论什么样世界观的评论家，你可以说三道四，可以恨之入骨，可你就是消灭不掉它！因为它的内在有着永恒的美，无阶级、无意识的“芳情只自遗”，践踏成泥“依然香如故”。

啊，我们在审美时，总是在辨认哪是香花，哪是毒草。我们总是通过显微镜、放大镜和化学试剂在观赏自然，这样做不累吗？安徒生童话里讲了一个故事：一座烧焦了的房子，旁边盛开着一丛绚丽的玫瑰。画家走过来，他感动了，便在旁边写生创作。倘这样问，这画家他是在为贫下中农作画，抑或为地主阶级？问话的人是否有毛病？我们警惕得是否过分了？看见一部作品，倘是写“要人”的，立刻联想到它是否“利用小说”来反党？写知识分子遭遇的，是不是“在讽刺”党的政策？写“三家村”的就是在组织什么小集团，写海瑞的那是为某某翻案。《水浒》是写“投降”，《三国》呢？是“英雄创造历史”……过敏得像得了神经病，脆弱得像系一根黄瓜或者“琉璃扑棱”儿。

蔡先生这部书的题材是写帝王将相为主的，和所有的旧知识分子一样，他无法避免一些陈腐的、落后的甚至是“反动”的东西。“反动”是否一定就坏，“革命”是否一定就好，这不在本文探讨范围。但蔡先生的这一系列确实做到了“两个拥有”，并还要“拥有”下去。我看它的生命力起码比我的书要强。从实效意义上看，它的生命力还在加强。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竖排版繁体字的“二十四史”呢？不能。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也不能。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，要绪，读蔡先

生的书可以导你入门，且是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真的是“厥功甚伟”了。

我是反感成分论的。无论从社会学概念，还是以文学评论界定标准，统统反感。看到现在一些评论家：你写一个海瑞式的正直官员，他说你在宣扬清官；你写一个忠于国家爱人民的志士，他说你歌颂“愚忠”；你写帝王将相呢？你是在颂扬“君权统治”，是“封建余孽”，是“奴才”……还是安徒生那则童话，画家是此意识，麻雀们又是彼意识，“吱！那有什么画头？那不过是些红的和绿的堆起来而已！吱！”

帝王将相不可以歌颂吗？歌颂他们便是反民主？我看不能这样说。我不能同意，用今天西方洋大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过去的中国，甚至我们现在的中国。只要走在历史上曾经对改善当时人民生活，对推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，对巩固当时国家和平统一、文学艺术昌明，对当时民族团结曾经做出过积极努力和贡献的人，无论李世民、雍正、李白、辛弃疾，抑或毕昇、黄道婆、蔡伦、郑和……就是要歌颂，管你说什么！

蔡先生的这套书，从文学性上说，只能说是“中平之作”。它是一座矿山，山一样的巍峨，中有茂林修竹、流泉飞瀑，内含煤铁金玉，自然也有土，有毫不起眼的砂石。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。前面说过，它不是应遵命评论应运而生，而是应时而生。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、新时代还在阵痛时，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部史诗史，可以听为挽歌，也可以看做新时代的催生符。这岂是几个在沙龙里坐唱，坐看别人辛苦，封就了自家是文坛盟主、骚坛执牛耳辈所能为！

是为序。

2003年10月



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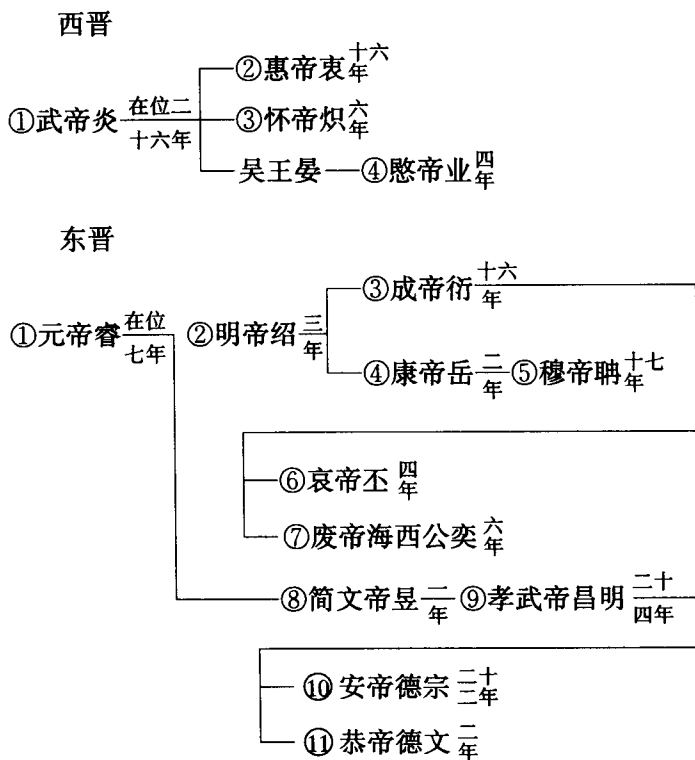
《晋书》百三十卷，相传为唐臣房乔等所撰，盖采集晋朝十有八家之制作，及北魏崔鸿所著之《十六国春秋》等书，会而通之，以成此书。独宣武二帝纪，与陆机、王羲之传论，出自唐太宗手笔，故概以御撰称之，义在尊王，无足怪也。后书评论《晋书》之得失，不一而足，而涑水《通鉴》、紫阳《纲目》叙述晋事，书法与《晋书》相出入者，亦不胜举焉。愚谓当今之时，以古为鉴，不必问其史笔之得失，但当察其史事之变迁。两晋之史事繁矣，即此内讧外侮之复杂，仆已更难详。宫闱之祸，启自武元，藩王之祸，肇自汝南，胡虏之祸，发自元海；卒致铜驼荆棘，蒿目苍凉，鳌坠三山，鲸吞九服，君主受青衣之辱，后妃遭赭寇之污，此西晋内讧外侮之大较也。王敦也，苏峻也，陈敏、杜弢、祖约也，孙恩、卢循、徐道复也，而桓玄则为篡逆之尤，此东晋内讧之最大者。二赵也，三秦也，四燕五凉也，成夏也，而拓跋魏则为强胡之首，此为东晋外侮之最甚者。盖观于东西两晋之一百五十六年中，除晋武开国二十余年外，无在非祸乱侵寻之日，不有内讧，即有外侮。甚矣哉！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也。夫内政失修，则内讧必起，内讧起则外侮即乘之而入，木朽虫生，墙罅蚁入，自古皆然，晋特其较著耳。鄙人愧非论史才，但据历代之事实，编为演义，自南北朝以迄民国，不下十数册，大旨在即古证今，惩恶



劝善，而于《两晋演义》之着手，则于内讧外侮之所由始，尤三致意焉。盖今日之大患，不在外而在内，内讧迭起而未艾，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，不特两晋为然，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。天下宁有蚌鹬相争，而不授渔人之利乎？若夫辨忠奸，别贞淫，抉明昧，核是非，则为书中应有之余义，非敢谓上附作者之林，亦聊以寓劝戒之意云尔。惟书成仓猝，不免罣误，匡我未逮，是所望于阅者诸君。中华民国十三年夏正季秋之月，古越蔡东藩自叙于临江寄庐。

两晋世系图

按晋武帝为司马懿孙，元帝则为司马懿曾孙，祖佑，父颢，皆为琅琊王。相传颢妃夏后氏与小吏牛金通而生元帝，故有牛代马后之谣，特附录之。



西晋传三世，凡四主，计五十二年。东晋传四世，凡十一主，计一百零四年，两共计一百五十六年。（《晋书》载西晋五十四年，东晋一百零二年，此为怀、愍失国后之二年，晋廷无主，仍用怀、愍年号，今读史家言，谓宜并入东晋，颇有至理，故从之。）

晋

武帝司马炎 (236~290)，字安士，河内温县（今属河南）人。司马昭之子。265年代魏立晋，改元泰始。280年平吴，结束了近100年的三国纷争，统一中国。在位26年间，他重视法制，招抚流亡，减轻赋税，劝课农桑，使破败凋敝的国家有所恢复。但是他分封宗室，强化门阀制度，同时放纵贪污，纵情肆欲，导致吏治大坏，奢靡之风盛行。为日后同姓王的内讧埋下祸根。



魏

晋南北朝时期，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交织，政治动荡、清谈，作为一种远离时务“谈尚玄远”的风气盛行起来。清谈亦称“清言”或“玄谈”，早在魏正始以后，为了逃避政治罗网，文士们不再评论时事，不肯臧否人物，以此作为全身之道。于是便有了阮籍的放诞，刘伶的醉酒，嵇康的冶铁。到了晋代，这种怪诞放达行为以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作为理论基础，发展成一种玄远空灵的美学思想，对后来的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作为玄谈的历史纪录和集中体现，《世说新语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最精彩奇妙的作品。



索

靖 (239~303)，字幼安，敦煌人。晋武帝时任尚书令、雁门太守、征西将军，与尚书令卫瓘并以擅草书著名，史称“瓘笔胜靖，然有法度，远不能及靖。”此帖波折中常有锐角，显得锋铓毕露，结构富于变化，细致而不落纤弱，在传世草书中别具一格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《出师颂》原帖失传，世传的是隋人的摹本，上有宋高宗所书的引首和米芾、乾隆皇帝的题记。此本曾流失海外，2003年7月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人民币收购。



魏

晋时期，在河西地区，即酒泉、敦煌一带，保存着很多封建割据的坞堡，因而大量的整齐的墓葬群也在这一地区出现。当地墓葬的最大特点是聚族而葬，并且均为凿建于戈壁砾岩上的有斜坡墓道的洞室墓。河西画像砖保留了汉代画像砖的许多题材，而以墓主生前的地位和生活为主要铺排内容。画像砖既表现墓主的宴饮、奏乐、庖厨，又描绘其居室内的女侍、丝束、衣物，还有庄园里的耕种、采桑、打场、放牧的场面，和城堡、营垒、步骑兵的画面。这些画像砖，笔法粗放、设色简单，还保持着我国汉代绘画那种写实技艺和那种天真烂漫、朴质纯净的审美趣味。



从

这一时期各地墓葬中，出土了许多形式各异的陶俑，较之汉俑，虽然古拙朴实之风尤在，但分明增添了几分清隽之韵，这和魏晋时代整个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相吻合的。另外，这一时期的陶俑表现的生活内容透出了许多当时日常生活的消息，如马上歌吹、弈棋、耕植等。而陶俑的衣冠服饰更是不可多得历史资料。

